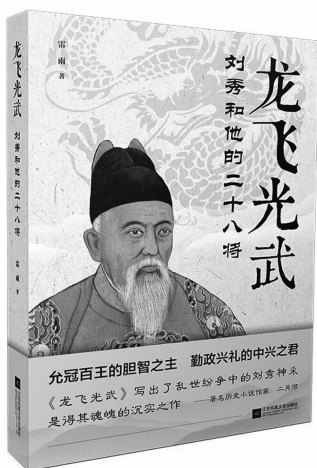


重新发现刘秀



《龙飞光武：刘秀和他的二十八将》
雷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雷雨先生让百义兄转来他写的《龙飞光武》书稿，看我可否为这本书写一个序。我近年来身体一直不大好，煎药静养，弄弄花草，看点闲书，写些小文，滚滚红尘外的不少应酬都谢却推掉了。但雷雨的《龙飞光武》，却不能一口回绝，敬谢不敏，想来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我虽然是三晋人氏，祖在黄土高原，但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父母过大地南下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南阳盆地，算是地道地道的南阳人了。雷雨是叶县人，古昆阳所在，与南阳关系紧密，我们是大同乡，而雷雨所写的人物，又是南阳刘秀，乡情盛意，岂能容我借故推脱？

二则是众所周知，我写满清皇帝中的康熙、雍正、乾隆，兀兀穷年，耗尽心血，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关于三个皇帝的长篇小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广大读者的肯定，很让我欣慰平生。皇帝这个群体，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独特政治现象，观照他、解读他、研究他、书写他，是一个长久恒新的话题。雷雨所写的光武帝刘秀，同我写康熙、雍正、乾隆相比，虽然比我起步晚，但琢磨用力念兹在兹的也是皇帝。他也许是觉得我是写皇帝的前行者，这才要找到我说几句话吧。

还有一层因缘。我写满清三个皇帝的“晚霞系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离不开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离不开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周百义先生。听周百义先生说，雷雨先生曾写过《江南绿衣堂》，也是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也是责任编辑。同一位责任编辑，都是对写皇帝有兴趣，又是共饮中原水，凡此种种，也算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呢。雷雨苦心孤诣，多年积累，在他父亲的悉心帮助下，终于写出如此厚重的《龙飞光武》，殊为不易，实在不能拂其美意，无动于衷。

《龙飞光武》写刘秀这个人，实在是得其魂魄。如今资讯发达，网络便捷，随便敷衍成文，不是难事。但雷雨先生写刘秀，不是天马行空，不是不着边际，不是依据片言只语就信马由缰、信口开河，他立足于严肃的史料，进行精心的求证爬梳，再加以合理的虚构，写出了乱世纷争中的刘秀神采，这种神采不是随便贴标签，不是先入为主地概念化，而是生动具体真切踏实的，的确理解把握了刘秀这个人，是得其魂魄的沉实之作。

《龙飞光武》不仅写刘秀这个人，更写了刘秀为首的这个团队，堪称得其神韵。刘秀遭逢乱世，处于社会底层，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天赋，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机遇，更重要的在于他能

够把握机遇，识人用人，团结他人，方才能脱颖而出，成就一番事业。雷雨的《龙飞光武》写出了刘缤、吴汉、岑彭、冯异、马援、邓禹、寇恂等诸多东汉初年风云人物的不同凡响，各呈异彩，让人真切地认识到云台二十八宿并非浪得虚名，而是货真价实的一代雄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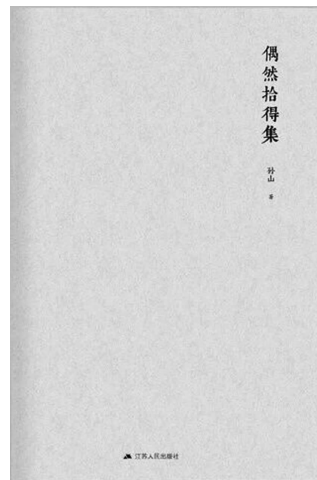
《龙飞光武》着墨于刘秀，倾心于刘秀的团队，更善于把握这个时代的脉络走向，大道之行，百川归一，十分娴熟地得其精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人物都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环境。雷雨的《龙飞光武》既写出了莽新与东汉交替之际的诸多人物，更揭示展示了这一时代的恢宏画卷：王朝的诡异与复杂，由治到乱的举手之间与由乱到治的艰苦卓绝，人性的光辉与幽暗，英雄的杰出与局限，时代的光怪陆离与五彩斑斓，这一人生与社会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残酷与苍凉。

《龙飞光武》共分四卷，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既有金戈铁马的大场面、大事件，也有轻裘缓带、君臣相得的小细节、小插曲，线索明晰，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引人入胜。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整个文本，语言精到，颇讲章法，看得出来，非熟读《汉书》《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不能为也。

大致在20年前，我曾应邀到南京，去东南大学的逸夫馆做过一次演讲。雷雨到我下榻的六朝松下的榴园宾馆来看我，他当时还是小伙子，听他讲自己的求学经历，讲他爱读我的书，我当时还雄心勃勃计划着说要写曾、左、李呢，转眼间，白云苍狗，都成往事了。如今，我已年逾花甲，雷雨也要到半百之年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葆有良知与见识的文本，这是一部精心打磨、对历史充满敬意与“理解之同情”的文本，这是一部浸透了真实情感的文本。是为序。

二月河

政治、诗与心灵皈依 ——孙山《偶然拾得集》序



古人每有不可思议、别出心裁、稀奇古怪之举，其一便是以诗赋取士。这等于将从政的资格与成为诗人的资格画上了等号——诗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诗人。以诗赋取士，乃中国国力极为强盛的唐代，也正是唐代，成为诗歌最发达的时代，唐代标志性的精神成就乃“诗”，“唐诗”正是中国作为“诗国”的高峰。“唐诗”似乎成为诗的一种标格，一种气象，一种境界！这不妨看作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政治哲学，在实践上有了政治美学的取向，甚至，是以政治美学覆盖了政治哲学——政治披上了诗意的纱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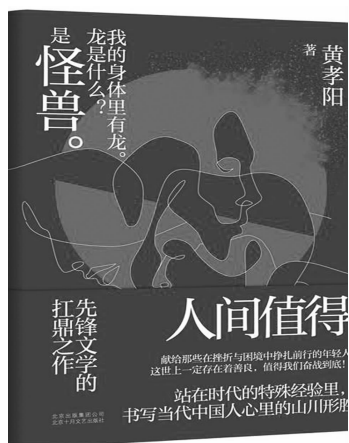
其实，何止唐朝，中国任何时代，都有着诗人政治家的传统，例如宋代的大诗人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等，直到清代的一些大诗人。这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传统。哪怕是乾隆皇帝，虽然诗品未必佳，却吟咏不倦，不妨说，他的附庸风雅，总比排斥风雅要强吧！何况，以《诗》《骚》传统贯穿整个文化，对中国心灵的浸润，则是难以想象的。

友人孙山，乃南京消防部队政委，以诗教化育人，是他本职要求的自然扩展；以诗抒发情怀，则是他自精神境界的升华。诗集题曰“偶然拾得”，意在自谦，但在在我看来，诗意之倏忽而来、倏忽而去，非有灵心，不可“拾”之，非有妙手，焉能“得”之！故自谦之中，实蕴诗理。诗集中，每有自警自悟语，但更多的，却是那种诗意的感悟，故有韵致溢出，令人悠然意远。如“月落山容瘦，日升水气寒”，“天长路遥雁影稀，千峰过尽无峰烟”，以新疆之景色，写出心灵之感悟，可谓神秀之句。而“千峰万壑排沓来，无边山河入胸怀”，更表现出扩大的气象。

以精粹的汉字锤炼的古典诗歌，要求着每个字都不可轻下。这，或者也与政治上的智慧相通，用人与用字，字眼与诗眼，都见出写诗者的“心眼”。孙山诗中，多有见出其胸襟气魄处，但更多见其真情流露处。如“坐观大江东，鱼跃浪涛风。天地何茫茫，悠然羡渔翁”。所谓“诗言志”，儒家将此“志”落实于世间，执着于现实伦理，但亦需有“志”外之“言”、“志”外之吟，孔夫子之“咏而归”，在大地山河之间“浴乎”“风乎”，逍遥于尘垢之外，岂非体现出某种特殊的诗意的超越？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的“拾得”，则来自精神的沉潜与超越的双重磨砺。岁月消磨，孙兄两鬓已生华发，惟愿诗性，注入青春，令生命的金树绿意润泽，悠悠无尽！
骆冬青

三哥的“观念事实”和黄孝阳的人间



《人间值得》
黄孝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黄孝阳在新作《人间值得》几乎彻底放飞了自我。小说里，三哥很忙，忙着喝酒、扯淡、指挥打手，操心生意……诸多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黄孝阳无意去讲述江湖，也没有把小说变成《古惑仔》式的基层流氓发家史，他反而让一个江湖大哥从一个最粗鄙问题去讨论哲学，讨论“观念事实”。

这事儿放在一个从“满脑子荷尔蒙的退伍兵，小瘪三，阴沟里的泥鳅”成长起来的江湖大哥身上有点拧巴。但不这么干就不是黄孝阳，就像他从不掩饰自己在小说里夹带私货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制造那种黄孝阳式的荒唐，要让精英立场和草根话语相互缠绕，要让形而上与形而下紧密相连。这不同于那种单纯基于语言或世俗趣味的调侃，也跟19世纪文学中那些夹叙夹议的说教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你也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叙述的无厘头，因为小

说似乎就在积蓄某种冒犯的力量，它是抽象的、逻辑的、高高在上的、星空式的思辨对市井与江湖的冒犯，又是世俗的、情色的、江湖道义与丛林法则的、狂欢式的叙述对精英、崇高的冒犯。相比黄孝阳之前的创作，放纵到起飞的《人间值得》才更像是先锋文学诞下的不服管教的坏小子，它带着那个年代哲学大讨论的热情以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势和语调，一头闯进了三十多年后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氛围之中。

正如前面所说，黄孝阳没让小说成为江湖风云录，却让它成了三哥的情史。但三哥不是韦小宝，三哥是个名副其实的恶棍。小说写了跟张三有关的七个女人，甚至一度在鹿野、小羽、许姜那里试试探探去讨论“爱情”。但在最后，小说几乎整个推翻自己有关“爱情”的叙述，因为“她们的痛苦与欢愉，我真的发自肺腑地了解吗？”

最让张三动情的大概是小羽。小说使用了一个结实又罕见的“我们”。这个“我们”把张三和小羽绑在一起，成为某种情感、经验乃至身份认同的证据。这无疑是一种有着强烈叙述效用的表达，因为在围绕小羽展开的故事中，先是汹涌而来的“我记得——”，然后是那个灵魂出窍式的面容模糊的“他”。“我”和“他”不断切换，“我”是“爱”，“他”是“罪”，这些分裂又不断冲突碰撞的片断是一场有关记忆、有关观念、有关语言与形式的游戏，但它们最终在小羽故事的结尾统一成“我们”，也就让这貌似花团锦簇实则通往虚无的叙述最终于小说自在的逻辑中找到了某个出处或某种真实。

如果说小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张三尚未“飞黄腾达”时期的镜像，那么朱璇则是徘徊在“三哥时代”里的另一个三哥。朱璇在“红磨坊”时叫作丽丽，“来自边疆苦寒处，在困窘与缺乏少食中长大，手脚犹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众多皴裂”。当然，这不能成为三哥选中她的原因，因为他所看重的是一些能够与自己真正契合的东西。在此，

不要讲什么灵魂伴侣，这与感情或灵魂无关，更何况三哥已在想象中把魂魄丢在了小羽那里。他要的是野心，是工具，是赤裸裸的社会性：“朱璇有天赋，有大块的才华，有戏剧性的表演人格，有一颗不怕死，甚至是渴望死的心脏。这很好，值得给她目标，给她野心与欲望，给她资源与机会，给她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足够她在这个台上唱念做打，以至于发出母狼一样的吼叫。”

除了七个女人，还有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男人刘启明。此人在张三身边最大的用处就是拍马奉承，极尽谄媚之能。刘启明“身上真是集中了文化人这种软体动物的各种毛病”。黄孝阳在小说里把“各种毛病”写到了极致，或者换种说法，他在用张三的霸道、扭曲、反复无常和无处不在的戏弄凌辱来一刻不断地榨取着刘启明的弱点。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着力的重点在张三身上而不是在刘启明身上。《人间值得》并非是为一个被荷尔蒙左右的好色之徒树碑立传，而是要在种种恶行里去写那声“长嚎”，所以刘启明也好，被张三以种种手段要挟的许国泰、孙平或是钟点工阿姨也好，他们都只不过是这个逻辑中的一颗棋子或一个证据。正如张三在小说最后面对朱璇的质问不得不承认：“我是在通过侮辱女性，操纵人心，以试图获得某种掌控之力……女性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物，顶多是渡江之筏——上了岸，谁还会问那张筏的下落与命运？”女性如此，小说中的男性又能有什么不同？

《人间值得》并不是一场文学形式的实验，它反而要以传统的或现实的叙述方式展开，无边无际、不计后果，甚至让那种不安分的、带有侵略性与破坏性的情绪、暗示和语言的狂欢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小说技艺的、颇具匠心的谋划和对现实的体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正如小说所讲述的人的“长嚎”，它粗犷、剽悍、暴虐、诡诈、下流，却也同时伴随着不仅仅是审美层面上的活力和意志，所谓人间值得。
李振